

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

刘瑞芝

(浙江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产生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狂言绮语观盛行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影响。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两者都针对文学被指斥为“妄言”或“虚言”的压力,极力为文学“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从而维护文学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狂言绮语观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的受容史与《源氏物语》的批评史互为表里,从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白居易;紫式部;《源氏物语》;狂言绮语观

[中图分类号]I109.3;I1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3-0085-06

产生于日本平安中晚期的《源氏物语》,在问世数十年之后即被视为“狂言绮语”的代表作,从而引起了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而这一切,既反映出《源氏物语》这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巨著,也是最优秀的小说之一”^{[1] p.272}的作品(约1001—1009),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又折射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密切关联。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源氏物语》及其作者紫式部(约978—1014)为研究对象,概略考察《源氏物语》问世前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背景、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①,以及当时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文学批评,以探究狂言绮语观嬗变的若干轨迹。

一、《源氏物语》问世前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背景

应和四年(康保元年,964),以庆滋保胤(约934—997)为代表的大学北堂学生(翰林书生)与比睿山僧人(台山禅侣),以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为理论依据,发起了在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劝学会。据劝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源为宪(941—1011)在《三宝绘词》(984)中的介绍,该会以白居易关于“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的愿文为行为准则;“定暮春季秋之望日,讲经念佛为其勤,今世后世为善友,法道文道相激励”,听《法华经》讲义,念阿弥陀佛,作赞佛、赞法之诗^{[2] pp.172-174}。从此,他们“言诗赞佛”,而劝学会极其自然地成为佛教与文学结缘的场所,但也因此被指责为“风月诗酒之乐游”^{[3] p.293}的所在。然而,

[收稿日期]2004-11-1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M03WX26)

[作者简介]刘瑞芝(1952—),女,上海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文化交流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古典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① 据叶渭渠《源氏物语·前言》(丰子恺中译本)的解释:“日文‘物语’一词,意为故事或杂谈。物语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公元10世纪初),它在日本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

在劝学会的文人群看来,“风月诗酒之乐游”仅仅是狂言绮语的表象,重要的是内在的佛教信心,即纪齐名(957—999)所说的“先讲经而后言诗,内信心而外绮语”^[3](p.293)。尽管触境而动见“染心”的狂言绮语诗文与传统佛教戒律处于二元对立之中,但可以按照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借助于“转为”或“翻为”等方便法门,使两者共存,从而增强对文学的信心与勇气,使诗文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4](p.76)。在这种情况下,狂言绮语观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思潮与文学思潮,而劝学会成了引领潮流的主力。可以说,这是《源氏物语》成立前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背景。

然而问题在于,平安中期中代表性文人群接受狂言绮语观这种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原因何在?诚如我们所知道的,自进入平安中期之后,日本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动,国家出现了空前动乱。因此,在僧俗中,佛教的“末法”思想广为流行,不少人感到人生无常,产生了厌世思想,对宣传来世往生极乐的《法华经》和净土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众多文人来说,鉴于当时维持国家秩序的律令体制遭到严重破坏,依靠儒家经书从政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也几近破灭,于是在“为荣分,为声名”而痛苦挣扎的同时,醉心于“风月诗酒之乐游”。然而,传统佛教信仰以及戒律与“风月诗酒之乐游”处于难以调和的对立之中。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使矛盾调和的方便法门与解脱内心痛苦的思想武器,以期解决以儒者的现实批判精神从政的理念、“风月诗酒之乐游”的生活情趣与法华净土信仰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们从白居易的诗文中找到了作为“外来天启”的狂言绮语观,成立了劝学会,将儒佛意识形态的和谐志向付诸实践^[4](p.79)。

要深入了解平安中期中代表性文人群接受狂言绮语观的原因,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并非仅仅是日本学者所说的“白居易的晚年思想”^[5](pp.4—9),而是白居易信奉佛教以来一以贯之的理念,也是他处理宗教信仰、生活情趣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准则。例如,他早在元和五年(810)所作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中,就以狂言绮语观维护自己文学创作的合理性,并用“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的辩解^[6](p.225),将宗教信仰与文学追求统一起来。可以说,他从佛教的人生虚幻观念出发,将文学的本质确定为“妄”,同时又极力为文学的“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在他看来,“夫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悟不深”^[6](p.225)。而文学一旦成为人在悔悟目的引导下的主动行为,以一种自觉的反思来叙写自己的“感”,就会像佛经中序火宅、偈化城那样,成为悟真的必要手段,具备了真的意义^[7](p.367)。而且在白居易的晚年,这种狂言绮语观更是臻于成熟,其标志被认为是《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以及《六赞偈并序》^[5](pp.4—9)。“狂言绮语”一词正出自《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夫以狂简斐然之文,而皈依支提法宝藏者,于意云何?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6](p.1131)在这里,白居易以传统儒教和佛道的准则界定“狂言绮语”^[6](p.977),似乎把不拘礼法、放肆妄言、纵情声色的诗文归于“狂言绮语”。尽管他对“狂言绮语之过”作过认真的忏悔,但从未彻底放弃。相反,他同时又借助于“转为”或“翻为”等方便法门,肯定了“狂言绮语”的存在价值^[8](pp.91—92)。

由此可以理解,这种狂言绮语观为何成为当时日本代表性文人群体在传统佛教伦理、道德和戒律的压力下,寻求精神解脱的终南捷径,成为释放丰富艺术创造力的思想武器^[4](p.75)。

在《源氏物语》问世前后的百余年间,正是劝学会的活跃时期,也是狂言绮语观被日本思想界与文学界所接受,并成为重要思潮的时期。值得关注的是,紫式部之父藤原为时(约942—1017)作为私淑白居易的著名学者与文坛巨擘,也是劝学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而紫式部幼承家学,学汉诗、习和歌、练琴箏、读古籍,尤耽于读《白氏文集》,其文学观与人生观深受白居易的影响。可以认为,鉴于以源为宪与藤原为时等为代表的10世纪后半期文人的沙龙中弥漫着狂言绮语之风,紫式部直接或间接接触狂言绮语观也并非不可思议^[9](p.12)。

二、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狂言绮语观

尽管在紫式部所留下的日记、家集以及《源氏物语》中找不到“狂言绮语”之词以及“狂言绮语”之过“这种明确的罪障意识，但仍然可以在《源氏物语》中不断看到狂言绮语观的存在⁹（p.7）。

正如叶渭渠所指出的，在日本古代文学思潮中，以主情为基调的文学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强调感情不能虚假，要始终贯彻真实的原则¹⁰（p.100）。同理，在《源氏物语》“萤”卷中，紫式部借助于源氏与其养女玉的物语谈义，展开了物语“是真实还是虚妄”的论述，并对玉反驳“物语虚假论”一事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其实，这些故事中，有记述着神代以来世间真实情况的。像《日本纪》等，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这里面记录着世间符合道理的一切吧。”（¹¹（p.438））源氏接着又谈到了物语的创作行为：“原来故事小说，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专集稀世少见的恶事，但这些都是世上的真人真事。”（¹¹（pp.438-439））然后，他针对人们对“虚言”的责难，以大乘佛教的逻辑，开了方便法门。他说：“佛怀慈悲之心而说的教义之中，也有所谓方便之道。愚昧之人看见两处说法不同，心中顿生疑惑。须知《方等经》中，此种说教之例甚多。归根结底，同一旨趣。菩提与烦恼的差别，犹如小说中善人与恶人的差别。所以无论何事，从善的方面来说，都不是空洞无益的吧。”（¹¹（p.439））这一谈义以儒教的观点，将物语与史书进行对比、论说，即视记录史实的史书为真实，视虚构情节的物语为“妄”，为“虚假”，为应被否定之物。在由此展开的物语虚实论的背后，可见传统佛教物语观——把物语看作狂言绮语的思想所投下的巨大阴影。这种物语论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内容，而是创作行为。对于紫式部来说，与“真实”相对的是“虚假”或“虚言”。她借源氏之口，一边说“虚言”，一边却认可其魅力，同时又用“旨趣相同”来抹杀虚实的差别。

由此可见，紫式部在狂言绮语观已成为重要的思想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中，以作家作为文艺本体的自觉，论述了物语的真妄问题，并以“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各异，同是日本小说，古代与现代亦不相同，内容之深浅各有差别，若一概指斥为虚言，则亦不符事实”的辩解¹¹（p.439）维护自己的文学创作。诚然，面临来自佛教戒律的非难，紫式部缺乏白居易那种虔诚的忏悔意识，而且以感性作所谓“虚实”的辩解，并不总是有力的，因而她像自己所崇拜的白居易那样，以佛教的“方便”说证明物语创作的合理性。所谓“虚言事实，旨趣相同”，诚如白居易所说的：“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¹²（p.1027））。相即非相，非相即相，使一切都被否定，而一切被否定的结果恰恰造成一切都被肯定。既然如此，就可以在创作中“一任我心，即事成真”，而不必拘泥于“虚实”。因此，紫式部似乎也极力以狂言绮语观摆脱狂言绮语的阴影，以出色的感性认识与譬喻，坚持自己的物语论。

三、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论争

平安中晚期，尽管物语文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仍未列入内典（佛）、外典（儒）、史书、诗歌这种正统的言语表达阶层。即使《源氏物语》一问世就在后宫与贵族妇女中不胫而走，而且时人耽读此书，有“这种感觉不啻当了皇后”的评论¹²（p.72），但传统文人仍对此不屑一顾。直至《源氏一品经表白》（1166）问世，《源氏物语》才引起文坛的注意。而随后的《今镜》（约1176—1188）与《宝物

① 本文所采用的《源氏物语》引文据丰子恺的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但个别字句则按西谷元夫的《源氏物语》注释本（有朋堂1983年版）并有所改动。

集》(约1187—1198)等,以狂言绮语观为理论基础,围绕“真实与虚妄”的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从而巩固了《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于平安晚期的《源氏一品经表白》,是日本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作者澄宪(1125—1203)作为安居院的法印大僧都,被时人认为是“天下名人”。在《源氏一品经表白》中,这个以传经说法为己任的权威,口吻严厉地批评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语。他说:“如此物语者,非传古人之美恶,非注先代之旧事。依事依人,皆以虚诞为宗。立时立代,并课虚无物事。其趣且干共,惟语男女交之道。”^{[13] p.144}作者断言紫式部所制的“言涉内外之典籍,宗巧男女之芳谈,古来物语之中以此为秀逸”的《源氏物语》:“艳词甚佳美,心情多扬荡。重男女之色之家,贵贱事艳之人,以之备口实,以之蓄心机。故深窗未嫁之女,见之偷动怀春之思;冷席独卧之男,披之徒劳思秋之心。故谓彼制作之亡灵,谓此披阅之诸人,定结轮回之罪根,悉堕奈落之剑林。故紫式部亡灵,昔托人梦告罪根重。”^{[13] p.144}澄宪以此表明,好色的绮语作者、迷惑于此的男女,必然堕入地狱。因此,根据佛教意识形态的物语观,作者从地狱中叫唤出紫式部的亡灵,以“源氏供养”的方法拯救紫式部及其读者。最后,作者还以佛教的烦恼即菩提的超越理论,宣扬了狂言绮语观。他说:“昔白乐天发愿,以狂言绮语之谬,为赞佛乘之因,为转法轮之缘。今比丘尼济物,翻数篇艳词之过,归一实相之理,为三菩萨之因。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共离苦海,同登觉岸。”^{[13] p.144}

藤原为经所作的《今镜》,同样是狂言绮语观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对《源氏物语》及其作者的评价发生了逆转。在《今镜》中,作者借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妪之口,对为堕入地狱的紫式部而吊唁的人进行劝导。他说:“大和也罢,唐土也罢,作文皆动人心,常导暗心,不应说妄语之类。若我身无事,不应煞有介事论说。令人以恶为善,才可谓虚诞……纵然绮语、杂秽语,亦未至此种深罪。”^{[14] p.604}她又引用白乐天文殊化身说,称赞紫式部“以女人之身作此等事,乃是非常之人,已成妙音观音,高贵圣女,惟以说法引导人哉。”^{[14] p.605}在这里,作者否定“妄语”、“虚诞”,认可“绮语”、“杂秽语”,甚至还以紫式部化身观音的说法而加以肯定。

应当指出的是,此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长期共存。例如《宝物集》之六云:“近闻有人梦见紫式部难以忍受因以虚言制作《源氏物语》之罪而下地狱之苦患,故一日歌人相聚,书经供养。”^{[15] p.54}由此可见,“紫式部堕地狱说”广泛流传的同时,在从事歌文者中间,屡屡为拯救陷入地狱的紫式部而进行“源氏供养”。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后世,“紫式部观音化身说”也不断出现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之中。例如,谣曲《源氏供养》(1384)直接以“狂言绮语”来借指《源氏物语》,并称紫式部为“石山之观世音”,旨在以《源氏物语》拯救众生。^{[15] p.59}而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源氏供养”在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

平安中晚期以降,狂言绮语观最尖锐地表达了文学精神。而且,正是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走向儒教“文学”之道的假名(女性文字)物语世界,对超越用语表层的狂言绮语观起了极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物语尚未列入“文学”的范畴,只有到《源氏一品经表白》问世时,物语才好不容易被认为是“狂言绮语”,并在内典、外典、史书、诗歌、物语这种意识形态的阶层中,与“文学”的末端联系起来。^{[16] p.44}从这个意义上说,狂言绮语观发挥了把“物语”作为“文学”评价的逆说作用。^{[16] p.44}“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以及由此展开的批评史,显示出以狂言绮语观为理论依据的物语精神,和以真实为基底的文学意识流贯于日本各种文学思潮之中。^{[10] p.100}

四、结 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产生于平安中晚期狂言绮语已成为重要思想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之中。(2)狂言绮语观体现了物语精神,紫式部的物语论与

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密切的联系。(3)围绕着《源氏物语》而展开的“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文学与佛道对立的二元论狂言绮语观的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狂言绮语观受容史与《源氏物语》批评史互为表里。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狂言绮语观从文学与佛道对立的二元论向狂言绮语观即佛道的一元论嬗变,从而使《源氏物语》逐渐获得了正面评价,甚至“狂言绮语”也成了“真言”。在镰仓中期至室町时期,随着狂言绮语观的普及并作为庶民教化的媒介,《源氏物语》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说法的工具。

[参 考 文 献]

- [1]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 [2] 源为宪(马渊和夫校注). 三宝蠹词[M]. 东京: 岩波书店, 1997.
- [3] 藤原明衡(大曾根章介校注). 本朝文蠹[M]. 东京: 岩波书店, 1992.
- [4] 刘瑞芝. 论狂言绮语蠹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J]. 外国文学评论, 2004(4): 74-80.
- [5] 山田昭全. 狂言绮语蠹成立考[J]. 国文学踏查, 1956(复刊1号): 1-16.
- [6] 白居易. 白居易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 [7] 谢思炜. 白居易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8] 刘瑞芝. 狂言绮语源流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3(3): 90-97.
- [9] 佐藤势纪子. 紫式部の文芸蠹—狂言绮语の文芸蠹への蠹蠹として—[J]. 季刊日本史, 1989(52): 3-18.
- [10] 叶渭渠. 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 [11] 紫式部(丰子恺译). 源氏物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12] 梶原正昭, 小林保治, 津本信博, 等. 日本古典文学史[M]. 东京: 武藏野书院, 1987.
- [13] 澄宪. 源氏一品蠹表白(拾珠钞之一)[M]. 东京: 第一书房, 1974.
- [14] 藤原为蠹. 今镜[M]. 东京: 诚文堂, 1932.
- [15] 伊藤正义. 谣曲集(中)[M]. 东京: 新潮社, 1986.
- [16] 高桥亨. 狂言绮语の文学—物语精神の基底—[J]. 日本文学, 1979(7): 33-45.

[责任编辑 何海峰]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ale of Genji* and the Views of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LIU Rui-zhi

(Institute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oldest and best novels in the world, *The Tale of Genji* (*Genji monogatari*), writte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Heian in Japan, was accomplished direc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Collected Works of Bai Juyi* (*Baishi wenji*, *Hakushi monju*) by the famous Chinese poet Bai Juyi (774—846) of the Tang Dynasty. As it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prevalence of the views of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Kuangyanqiyuguan*, *Kyougenkigokan*) in Japan's ideological and literary history, and its author, Murasaki Shikibu (ca. 978—1014), enjoye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active advocators of the ideas, the work was naturally stamped with Bai's views of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The views were the very important literary thought of Bai's, through which he solv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personal taste and literary pursuit.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Bai defined the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as which he regarded poetry and prose with wanton words and libertinism in love and merry-making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customs. Meanwhile, however, he defended for the special value and the truth of literature,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turn vanity into truth and evil into good by way of Buddhism. Although he didn't have the pious confession of Bai Juyi, Murasaki Shikibu took advantage of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regardless of the pressure from Buddhism. He thought that "truth and fantastic words are ultimately the same" in a novel, which proved his view on story writing to be reasonable. Therefore, he solved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d literary creation. Later 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there were lots of arguments about "vanity and truth", reflecting the two extreme views about the said theory: *The Tale of Genji*'s falling into the inferno and being the incarnation of Guanyin (Kannon, Avalokitesvara-Bodhisattva). The former held that Murasaki Shikibu had fallen into the hell because of his creation of pornography, and he and his readers could only be saved by Bai Juyi's instructions. The latter, however, held that Murasaki Shikibu was the incarnation of Guanyin, enlightening all living creatures with his *The Tale of Genji*, which was based on Bai's literary thought. No doubt,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have enjoy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for they have wide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Tale of Genji*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Bai Juyi; Murasaki Shikibu; *The Tale of Genji*; views of "wild words and flowery expressions"

本刊讯 2005年2月25日至27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剑桥大学经济学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应邀访问浙江大学,并受聘为浙江大学“名誉教授”。莫里斯教授由于在信息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关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论述,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25日上午,莫里斯教授在浙江大学作了题为“创新与经济增长”及“Incentives and Taxes for Entrepreneurs”(企业家的激励与税收)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获好评。

本刊讯 为了研究与推广中国尤其是浙江温州农村工业发展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与启示,由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大“卡特”)、温州市政府、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IFPRI)和国际发展高级研究基金会(FASID)共同主办的“非农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3月19日至22日在温州召开。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IFPRI)与国际发展高级研究基金会(FASID)的高级官员和知名学者、埃塞俄比亚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以及浙江大学、浙江省农办、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法制局、温州市政府和市委党校等四十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浙江大学副校长、本刊主编胡建森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外学者以浙江省非农产业,尤其是温州农村工业以及温州鞋业集群发展为例,就经济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非农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非农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非农经济发展与农民就业、农民增收,非农经济发展与产业集群形成,非农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非农经济发展与政府作用,温州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康奈集团、温州报喜鸟集团、奥康集团、红蜻蜓集团、“温州鞋都”、龙港镇及专业市场等。专家们还与温州企业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并对温州模式的意义及其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